

第二輪班 導讀

導讀 家事分工：與父權的討價還價

藍佩嘉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）

《第二輪班》首度出版於一九八九年，三十年來三次重版、屢屢再刷，是什麼原因讓這本書成為美國社會學界最暢銷的書籍之一？

如書名破題，雙薪家庭中的女性，除了白天上班，晚上還要輪家務的「第二班」。在當時的美國，已婚女性一年要比男性多出整整一個月的工作時間。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系教授亞莉·霍希爾德（Arlie Hochschild）進一步想挖掘：夫妻雙方如何看待家務的意義？如何感受對方對家庭的貢獻？如何發展出不同的「性別策略」來維持婚姻生活中的權力平衡，並協商符合社會期待與自我認同的性別特質？

為了回應這些問題，霍希爾德在助理協助下，訪談了五十對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異性戀配偶，並且觀察了十二組家裡有年幼子女的雙薪家庭。在陌生人家庭裡做田野觀察，是一件很困難、也很尷尬的事，研究者只能「儘量讓自己像家裡的一隻狗那樣不引起注意。」透過作者敏銳的眼與生動的筆，讀者彷彿也匍匐在書中十個家庭的客廳與廚房的角落，體察這些夫妻的日常拔河。

本書精彩的田野發現，駁斥了許多常識性的預設或簡化的因果解釋。人們經常認為是薪資高低影響性別分工：所得較高的家庭成員（通常是男性），基於邊際效益法則，花較少時間在家務工作上，或因為財務貢獻高讓他在家中有較多權力。從本書的家庭案例來看，經濟邏輯雖然重要，但無法充分解釋。其中的男性可分成三組：賺錢比太太多的男性，有 20% 會分擔家事；賺錢跟太太一樣多的男性，有 30% 會分擔家事。但是賺錢比太太少的男性，反而沒有人分擔家事；因為他們感受到陽剛特質遭受財務威脅，反而更不願意分擔「女人家的工作」。

另一種常見觀點則用性別意識形態來解釋家務的性別分工，但本書內容呈現更為複雜的家庭現實，人們的價值信念與情緒感受經常有重大斷裂。一般來說，藍領階級家庭較偏好傳統性別分工，白領階級家庭較偏好平等婚姻。然而，由於缺乏經濟安全感與工作尊嚴，藍領男性未必能成功扮演養家角色，而貧乏的日托措施、沒錢購買家務與育嬰的服務，讓他們的婚姻雪上加霜。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，雖然較認同家務平等分擔，但也要面臨職場上的壓力與同事的競爭。

霍希爾德提出一個極有創意的概念「感謝的經濟」（economy of gratitude），

來描述伴侶之間的權力互動。夫妻間的衝突，往往不源於勞動分工的不均（誰做家事？誰不做家事？），而是文化意義認知上的矛盾（什麼構成對方送我的「禮物」？我們應對什麼心存「感激」？）。當快速變遷的女性，遇上緩慢變化的男性，往往造成夫妻雙方對於「禮物」有不同評價，因而未能互惠「感激」，衍生不滿與衝突。比方說，一位先生認為相對於自己父親或其他同事，他對家務的「幫忙」應該足以讓他得到「新好男人」的美名，但太太認為自己同樣工作了一整天，期待先生更平等的付出。一位太太認為自己的高所得是對家庭的貢獻，但先生可能對這樣的「禮物」不領情，視為對他的男性認同的威脅；當她意識到先生的受挫或沮喪，反而要藉由服侍家事，來展現女性特質，或彌補先生失去的權力。

日常生活的家事分工揭露了女人與父權持續且幽微的討價還價。希望先生分擔家務的女性，很少直接跟先生攤牌，多數人用間接方式表達，如裝無助、裝病痛，甚至以性生活為交換條件。更常見的是，壓榨自己成為「超級媽媽」、削減自己的職場投入，或是尋求長輩的外援、市場的外包，來緩和婚姻內的衝突。

除了資料豐富、分析精彩，本書的寫作風格，更讓它成為美國大學課堂的社會學必讀書。我有幸在霍希爾德教授的指導下進行一年博士後研究。曾經聽她說，每本書她經常會寫兩個版本，第一稿中規中矩，讓她向內心裡的學術大師致敬，其後方可剖去術語、重生血肉，寫出平易近人卻又深刻的公共社會學著作。

親密關係中的情緒政治與性別權力，是霍希爾德多本著作的核心關懷。她的第一本書 *The Managed Heart*（《被管理的心》，台灣譯為《情緒勞動的管理》），從空服員的工作經驗，提煉出「情緒勞動」的重要概念。她也研究像 Google 這樣的高科技公司職場，為何讓人們覺得「回家好累，上班反而比較輕鬆」？她訪問教人如何上網交友的專家、規劃小孩生日派對的顧問，探詢親密關係變得日益市場化與商品化，會造成怎樣的後果？甫出版的《在家鄉的異鄉人》（*Strangers in Their Home Land*），則因應當代局勢，透過深入訪談美國南方右派支持者，試圖了解投給川普的平民百姓為何如此憤怒與哀愁。

《第二輪班》出版已屆四十年，美國社會的性別平等與家務分工有沒有明顯的改善呢？根據當代家庭評議會的最新調查，¹美國社會的兩性平等雖然有所進步，但一九九〇年代後限於遲滯。所謂的千禧世代（一九八一—二〇〇〇年間出生）甚至呈現「性別反挫」的趨勢，他們雖然支持教育與職場上的性別平等，但與家庭與婚姻相關的性別態度，反而趨於保守。調查發現，在一九九四年，有 42% 的高中生認為男主外女主內是最理想的家庭安排，採取類似看法的人到了二〇一四年卻增加到 58%。當問到職業母親是否能像全職母親一樣與孩子建立穩

定而溫暖的關係時，一九九四年的高中生中有 48%認為不能，到了二〇一四年卻增加到 60%。換言之，隨著公領域實現較多的性別平等，私領域的性別角色反而更將強化，尤其是男性，偏好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，認為可以減少婚姻內的緊張衝突。表面上看起來，家事分工單純是夫妻之間的協商，但其實社會制度扮演重要的影響，由於美國的托育公共化程度低，性別反挫的趨勢更為明顯。

台灣呢？在多數的家庭裡，有偶女性（含同居）仍是主要的家務工作者。根據主計處調查，一九八七年，女性每週從事家事時間平均為 33 小時，遠高於男性的 3 小時（11 倍、差距 30 小時）。女性家務工時到了二〇〇〇年下降為 23 小時、二〇〇六年為 16 小時，男性的家務工時則略微上昇到二〇〇〇年的 4 小時（6 倍、差距 19 小時）、二〇〇六年的 6 小時（3 倍、差距 10 小時）。²男女差距的縮小，主要源於女性家務時間的減少（可能因為外食增加、電器協助與服務外包），而非男性的協力分擔。若從家事項目來看，除了倒垃圾、育兒、照顧老人或病人等部分已漸由家人共同分攤，女性負責的多為例行勞務，如打掃、買菜、煮飯、廚房清理及清洗衣物，男性負責的多為偶發性工作，如房屋修繕、水電維修等。³

年份	女性家務時數	男性家務時數	差距	倍數（女÷男）
1987	33	3	30	11
2000	23	4	19	6 (5.75)
2006	16	6	10	3 (2.67)

▲台灣歷年男女家務時數比較（單位：小時）

台灣的研究普遍支持資源論的說法，不論男女，個人的薪資增加、職業地位提高、相對於配偶的經濟獨立性高，都會使得他們參與家事的程度降低。⁴但男性的教育程度的影響，則有不一致的發現：教育程度高的男性，可能趨向認同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，也可能將其社經地位轉化為相對配偶的權力，反而強化傳統分工。⁵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，通常投入家事的時數較少，但由於她們的育兒觀念與方式接近「密集母職」，花在托兒的時間反而提高。⁶也有研究發現，當太太的教育程度高過先生時，差距越大，女方反而負擔越多的家務工作。⁷

我們需要更多的量化與質化研究來探討台灣的家庭生活與婚姻關係，尤其是：不同階級、族群，甚至性取向的家庭，如何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協商家事分工與伴侶關係？延伸家庭、公婆長輩在家務或育兒上的干預或協力，對於核心家庭的伴侶關係有何影響？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有何連動關係？台灣女性在教育機會與成就上已經愈趨平等，職場上的差別待遇與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，但也

有所鬆動。相對於公領域的性別主流化，家庭、婚姻場域中的性別革命仍然遲滯。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，不婚、不生的趨勢，反映出台灣女性的一種出走策略。少子化如果是國安危機，如何達成托育的公共化、職場的家庭友善、親密關係的民主化，就應該是最迫切的前瞻建設。

註釋

¹ Council on Contemporary Families, 2017, “Council on Contemporary Gender and Millennials Symposium”, 下載網頁：

<https://contemporaryfamilies.org/ccf-gender-and-millennials-online-symposium/>

² 一九八七、二〇〇〇年的資料來自蕭英玲（2005），台灣的家務分工：經濟依賴及性別的影響，《台灣社會學刊》，34: 115-145。行政院主計總處（2006），《社會發展趨勢調查》。

³ 行政院主計總處（2006）。

⁴ 見蕭英玲（2005）相關文獻回顧。

⁵ 呂玉瑕、伊慶春（2005）的研究比較不同世代來考察社會文化脈絡的作用。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接近「修正父權社會」，高學歷男性始容易接觸性別平等價值觀。一九九〇年代接近「轉型平權社會」，教育程度轉化為社經地位、資源權力的影響較明顯。呂玉瑕、伊慶春（2005）社會變遷中的夫妻資源與家務分工：台灣七〇年代與九〇年代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，《台灣社會學》，10：41-94。

⁶ 行政院主計處，《102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》，

<https://www.dgbas.gov.tw/ct.asp?xItem=35733&CtNode=3304&mp=1>

⁷ 陳狄秋（2011），《夫妻家務分攤的角力——教育與所得差異扮演的角色》，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。